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清代疆域形成研究

成崇德 主编

刘文鹏 著

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  
形成关系之研究

中国大学出版社

清代疆域形成研究

成崇德 主编

刘文鹏 著

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  
形成关系之研究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 / 刘文鹏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5

(清代疆域形成研究 / 成崇德主编)

ISBN 7-300-05547-8 / K·265

I . 清...

II . 刘...

III . ①驿站 - 研究 - 中国 - 清代 ②疆域 - 研究 - 中国 - 清代

IV . K928.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45484 号

清代疆域形成研究

成崇德 主编

**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

刘文鹏 著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239 (出版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m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方圣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10.875 插页 2 印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50 000 定 价 22.00 元

---

## 总序

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与现实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发生着重大变化，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中国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有很大的影响。要解决当前边疆地区的一些问题，必须了解历史，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通过对边疆历史的研究，来驳斥形形色色的敌视中国的霸权主义者和扩张主义者歪曲历史事实、为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侵略行径进行辩护的种种谬论，帮助人民认识历史，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珍惜和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清代疆域形成至今仍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课题。

国际上，特别是欧美国家一直有着对中国疆域形成研究的传统。还在19世纪，欧洲主要国家如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俄国甚至丹麦和瑞典，已经发展起了内陆亚洲、中亚、北亚各民族及疆域问题的专门研究（如阿尔泰学、中亚学、蒙古学、藏学、满学等研究都涉及中国疆域），出现了一批享有盛誉的学者和学术著作。进入20世纪以后更是名家辈出。在一些国外学者中出现了如下一些观点：中国清代是通过对外扩张形成自己的疆域；中国清朝对边疆民族地区实行殖民主义统治；中国的疆域在长城以南、嘉峪关以东；西藏、蒙古、西域诸国是各自独立的国家；等等。至今，国际社会仍然有一些国家政府和学者宣传上述观点。

中国疆域形成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疆域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但奠定于清代。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如何形成和确定，在史学界争论较大。中国疆域形成的因素比较复杂，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是中国疆域延续两千多年的基础。中国疆域的发展变化表明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深厚力量和悠久历史。

第二，历史上活跃在中原王朝四周的少数民族对中国疆域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民族因素极大地影响着当代世界许多国家的各种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影响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同样，民族因素也极大地影响着历史上许多国家的形成和疆域的范围。中国古代民族格局和民族关系与中国疆域的形成密切相关。对于呈多元一体格局的中华民族的形成，边疆各民族和中原各民族一起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三，地理环境是影响一个国家疆域形成的重要因素。中国古

代文明在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的连续性以及多民族统一和联合的趋势，也受到客观条件，即地理环境的影响。从整体来看，中国地理环境有其统一性。各地区之间地理上的间隔和区别并不能阻断其相互间的往来。中国地理环境的统一性和政治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维系国家统一的一个重要条件。

清朝的功绩在于其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使当时边疆地区由分裂状态走向统一，比较明确地划定了疆域范围，对边疆地区实行了行之有效的主权管辖。

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课题“清代疆域形成研究”将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

第一，清朝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运用近代制图学的新方法，根据中国历代王朝管辖范围和边疆各民族的活动区域，绘制了国家地图，同时又把测绘地图与国家的统一和疆域范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康雍乾三朝绘制了康熙《皇舆全览图》、雍正十排《皇舆图》和乾隆《内府舆图》三幅国家地图，这三朝的地图成为我国后来绘制国家地图的依据。尤其是乾隆《内府舆图》，是当时中国疆域范围的最好历史见证，它对于巩固边疆、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解决现在领土边界争端也有巨大的说服力。本课题将以这三朝地图为重点，详细考察清朝绘制国家地图的历史依据、外部环境及当时国际社会对清代地图的看法，探讨和分析当时中国地图中疆域走向、绘制的理论根据和历史依据，对康雍乾三朝地图中疆域范围的共同点和差异之处进行比较研究。

第二，清代疆域的形成不仅仅是一种自然事实，更是一种法律事实。从国际法角度研究清代疆域问题目前尚鲜人涉足。在西方法学东传的过程中，国际法是在各部门法学中最早传入中国的，但发

展不及民法学和刑法学等。而国外一直注意利用国际法为所在国家疆域版图寻找法律根据，如国外学者在研究西藏在历史上的法律地位及中印边界（主要是“麦克马洪线”）等问题时广征博引，利用了大量英国外交部档案和联合国有关法律条文。本课题试图将国际法引入历史研究当中，从法律角度论证清代我国疆域的形成。

第三，清朝统一边疆以后，对边疆地区实行了行之有效的主权管辖，对各边疆民族地区因俗而治，形成了治理边疆、贯彻边疆民族政策的一套自上而下、强而有力的完备的边疆民族管理机构，实行多种形式的管理制度，对国家疆域的巩固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本课题将对清代统一边疆地区的模式和行政管理构架进行研究。

本课题最终由五部专著组成：

成崇德：《清代疆域形成与行政建构》；

张世明：《国家的法律空间：清代疆域形成国际法研究》；

孙 喆：《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

宝音朝克图：《清代卡伦研究》；

刘文鹏：《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

这五部专著将分期出版。

本课题的研究得到“十五”期间“211工程”清史研究项目的资助。

# 目 录

---

## 绪 论 疆域形成过程中的清代驿传系统 (1)

---

### 第一章 清代以前驿传系统的发展状况 (20)

---

#### 一、先秦

——驿传系统形成雏形时期 (21)

#### 二、汉唐

——驿传系统渐具规模时期 (26)

#### 三、宋元明

——驿传系统趋向完备时期 (33)

**第二章 清代驿传网络的形成 (43)**

- 一、行省区的驿传网络 (46)
- 二、边疆地区的驿传网络 (97)

**第三章 清代驿传系统的管理体制及其变革 (128)**

- 一、清朝中央的驿传管理机构 (129)
- 二、行省区驿传管理体制的变革 (135)
- 三、边疆地区台站系统的管理 (149)

**第四章 清代驿传系统的功能与制度之变革 (164)**

- 一、驿传牌符制度的变革 (165)
- 二、功能之一：安全、高效的文报传递
  - 清代公文邮递制度的改进 (175)
- 三、功能之二：官员接待
  - 清代驿传给驿制度之调整 (206)
- 四、功能之三：物资递运
  - 清代驿传运输制度的调整 (219)

**第五章 清代驿传系统之财政供给政策 (225)**

- 一、清初的驿传财政和差役制度的变革 (225)
- 二、驿传系统的物质因素 (238)

三、清代驿传的财政政策  
——因地制宜 (252)

---

**第六章 清代驿传系统的困境及其近代变革 (259)**

- 一、清代驿传系统面临的困境 (260)  
二、西方近代通讯、通信制度的影响  
——传统驿传系统的变革 (280)

---

**第七章 清代驿传系统的作用及其与疆域形成之互动关系 (299)**

- 一、清代驿传系统在中国古代驿传史上的地位 (299)  
二、清代驿传系统对政治体制完备的推动作用 (301)  
三、清代驿传系统在疆域形成中的作用 (305)  
四、对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以东北地区为例 (314)

---

**附录 1 清代驿传事纪 (320)**

---

**附录 2 参考档案和文献 (330)**

## 绪 论

### 疆域形成过程中的清代驿传系统

清代的驿传系统，顾名思义，是指清代以驿站为主的信息传递方式的总和。从功能上讲，驿传系统集官员接待、文报传递、物资运输于一身。从信息传递的角度来说，官员出行可以看做信息传递的特殊方式，交通运输在很多情况下也能被视为信息传递的结果。作为一个体系，它还包括驿站以外的台、站、塘、铺等信息传递组织。从地域范围上来说，清代驿传系统以北京为中心，遍布各省以及将军、都统、大臣辖地，而在边疆地区的发展则是其主要内容，是其超越明代的地方。

驿站是驿传系统的主干，从含义上讲，清代的驿站应该包括驿与台、站。驿是对行省区驿传设置的称

呼，台、站则指在边疆地区的驿传设置。在清代以前，驿与站二字是分开用的，汉族政权多用驿，如明代称之为水马驿；少数民族政权多用站字，如元代之站赤。（光绪朝）《清会典》中对驿与站作了区分：“各省腹地所设为驿，盛京所设亦为驿。”<sup>①</sup> 台、站大多位于东北、蒙古、新疆或青藏等边疆地区。但在实际政治、军事生活中，无论皇帝的上谕还是地方大员的奏折，驿、站二字一起使用的情况已经极为普遍，少有区分。

作为清代驿传系统主体的驿站，在功能上与以往各代的驿站有所不同。在以前，驿站并不同时具备文报传递、官员接待、物资运输三项功能，清代的驿站则集三种功能于一身。自春秋战国时期到元明两代，负责接待官员的驿馆一直是驿传系统中最主要的一项设置，而且各代都极讲排场与豪华。如前所述，春秋时期晋文公、郑国的子产等都曾视驿馆的建设为国家政务兴废的标志，主张不惜重金加以修缮。唐宋时期更是如此，驿馆之设，不但豪华，且有等级之分，这曾让许多文人墨客为之赞叹。但到明清时期，驿站建筑趋向简朴实用的风格已经非常明显。<sup>②</sup> 尤其到清代，在许多名人的游记或旅行日记中，很难再见到对驿站豪华设置的慨叹。在由四川经打箭炉入藏的道路上，只有打箭炉的驿站“有池、有塘、有室、有楼、有亭，足供栖止”，其余驿站很长时间内根本没有专门的房舍，大多借住民居。直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清朝用兵廓尔喀，

<sup>①</sup> （光绪朝）《清会典》卷五一。

<sup>②</sup> 清代顾炎武曾对这一趋势有过明确的表述：“读孙樵《书褒城驿壁》，乃知其有沼、有鱼、有舟。读杜子美《秦州杂诗》，又知其驿之有池、有林、有竹。今之驿舍殆于隶人之垣矣。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朝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麻舍之为唐朝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愈陋。”参见顾炎武著、黄汝成释：《日知录集释》，44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这里的驿站才被修缮得较为宽敞。<sup>①</sup> 顾炎武对此多有批评，认为这是由于人情日益苟且所致。然而，驿站之所以在建筑风格上有这种由奢华而日趋朴实、简单的变化，与它在功能上的转变也有内在联系。明清以前，驿馆之所以修得豪华，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驿站在官员接待和文报传递两方面的功能是分开的，驿馆负责官员接待，文报传递主要是由铺或其他信息传递组织承担的。自元代起，驿站不仅仅是接待官员的馆舍，而且开始承担重要军政文报的传递。这种功能极受重视，驿站也因此越来越被看做保持国家血脉通畅的关键所在。<sup>②</sup> 清代则继续将驿站的这两项功能合而为一。

至于文报传递与物资运输功能合并的趋势在清代则更加明显。明代的驿与递是分开的，驿指驿站，主要负责文报传送和官员接待；递指递运所，主要负责物资转运。以云贵地区为例，明代在云贵地区的驿传系统特点之一是驿与堡并用。明代在云南共有 78 处驿站，在贵州有 32 处驿站，驿站的设置线路和清代基本相同。驿站之外，明朝又在交通要道上遍布军堡，以军士实之，与驿站相呼应，相当于内地的递运所。<sup>③</sup> 这种堡的设置是与明代的卫所制度相适应的，军士授以田土，而不给口粮，其职责除了作为防守

<sup>①</sup> 参见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编：《打箭炉志略》，乾隆年间修，吴丰培校订，1979 年油印本。

<sup>②</sup> 明代的一些大臣也认为：“驿递天下之血脉也，血脉不容一日稍郁，邮传之设不可废也。”参见《兵部呈为江西巡按范复粹题驿站工食之扣减宜酌事本》，载《历史档案》，1983（1）。

<sup>③</sup> “洪武二十年十二月丁巳，遣前门郎石壁往云南，谕西平侯沐英等，自永宁至大理，每六十里设一堡，置军屯田，兼合往来递送，以代驿传。”《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七，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据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影印。

军队外，也负责递送文报、运送物资的事务。<sup>①</sup> 与明代不同的是，清代的驿与递是合而为一的。在康熙朝的《大清会典》中，递运所仍然存在，并归入邮政之中，显然清初继承了明代的驿递制度。但在康熙朝以后的清会典中递运所不再出现；同时驿站中已经配有专门负责运输的驿夫，无论是军用物资还是地方贡品都是通过驿站转运的。这说明递运所已经并入驿站，驿站兼具递运所的功能。清代在云贵地区的堡的设置也有这样一个过程。在康熙朝《大清会典》中，云南有 27 处驿站，而在雍正朝的《大清会典》中云南只有 13 处驿站，这种差别在于，前者将堡视为驿站，后者将堡视为驿站的附属。具体而言，清代的堡与明代的堡有以下两点不同：（1）在人员配置上，明代的堡以军士充当服役人员。清代的堡夫来源有二：一是原来明代遗留，这一部分人世代以此为业，国家给予田地，名为冷饭田，耕田自给，同时国家免其赋税，令其专职服役；二是雇募。原明遗留的堡夫，逃亡情况非常严重，如云南府炼象堡的 90 名堡夫逃亡故绝 56 名<sup>②</sup>；赵州白崖堡原设堡夫 84 名，逃亡故绝 79 名；下关堡 100 名堡夫逃亡故绝 70 名。<sup>③</sup> 对此，清朝没有再补充配额，而是在现有基础上根据差务繁重程度，直接给银，雇募乡民充当。（2）从管理上，明代的堡归军队卫所管理，其经费也由卫所提供。清代在云南的堡都属于驿站系统，先由驿丞管理，如滇阳堡归滇阳驿丞管理，板桥堡归板桥驿

<sup>①</sup> “云南有驿无递，故以堡代之，有驿必有堡，堡主递送，领以百户，世职其事；实以军士，世役其事。官军皆国初拨定人数，环堡居住。有田无粮。”（正德）《云南志》卷二，转引自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1147 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sup>②</sup> 参见张毓碧修，谢俨等纂：《云南府志》卷四，康熙三十五年（1696 年）刻本。

<sup>③</sup> 参见傅天祥修，黄元治纂：《重印大理府志》卷四，康熙三十三年（1694 年）修，1940 年铅印本。

丞管理；后来都归并于州县。

清代驿传系统在驿站之外还有铺、塘。铺，又称急递铺，靠人力步行接递各级官府的日常公文，密布于各省的府厅州县之间。清代的铺递组织直接脱胎于明代。全国有铺13 935处，铺兵44 643人。铺是专门的文报递送系统，负责传递中央各部院与各省，以及各省府州县之间的日常公文，不承担官员接待、物资转运的任务。在文报传递方面，铺与驿站的区别是，驿站所递文报是中央和各省省级官员，或省级官员之间有严格时间限制的文报，主要包括廷寄、紧要奏折、题本。<sup>①</sup> 这里的省级官员应该包括，各省督抚、藩臬、提镇以及重要道员，各地的驻防将军、大臣、都统、副都统等。铺则递送中央和各省省级官员，或省级官员之间，以及各省所属的府厅州县间的日常文报。<sup>②</sup> 各省在京城都设有驻京提塘，其职责之一就是收发中央与各省之间由铺递送的寻常公文。<sup>③</sup> 铺的间距一般为15里，每铺设铺司一名，铺兵四名，由国家发给工食银。文报到铺后，由铺司登记，再由铺兵步行递至下铺。其速度一般要求每昼夜300里。铺递系统的费用与驿站一起，由各省向中央奏销。

驿站与铺互为补充，使整个国家的信息传递系统得以完善。以

<sup>①</sup> 雍正九年议准：“文武各官来往公文，有事关军机及紧要刻难迟缓者，一面由马上飞递，一面将飞递缘由知会驿传递备案。”参见（光绪朝）《清会典事例》卷七〇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据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刊本影印。

<sup>②</sup> 参见（光绪朝）《清会典》卷五一。又如：“奉天将军及五部、府尹有紧要公文，交盛京兵部由驿递送。寻常咨行在京部院及咨行各省公文，归并直隶提塘办理，由通州知州发铺司，交提塘查明分送。至在京部院发往奉天各衙门紧要公文，由部交驿递送；寻常公文，均交直隶提塘，由通州知州发铺司，即送到奉天所属地方，交马快即送。”（光绪朝）《清会典事例》卷七〇二。

<sup>③</sup> “驻京提塘十六人，掌递部院官文书，送敕印以达于本官。”（光绪朝）《清会典》卷五一。

云贵地区为例，云贵地区驿站的密度很小，只是将一些重要的府州县连接在一起，如贵州全省的驿站如羊肠一线，自东北向西南贯穿，还有更多的地方驿站没有到达。与这些无驿地方的信息往来都是通过铺或铺与驿站的连接来完成的。如思南府位于贵州的东北部，南距施秉县的偏桥驿约295里，日常文报由铺递完成，紧急文报则由铺递至施秉县的驿站。<sup>①</sup> 更具特点的是云贵地区铺与铺之间的距离明显大于其他省份。中原省份的铺距一般为十里到二十里，云贵的铺距大都在三四十里以上，在僻远之地则可能达到七八十里乃至上百里。如在腾越州，自州“三十里芹菜塘铺，六十里橄榄铺，八十里龙川江铺，一百里竹芭铺，一百二十里分水岭铺”<sup>②</sup>。

塘在清代是一个有多种含义的词语。清会典的解释是，塘设在西北安西、哈密、镇西一带<sup>③</sup>，这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即其他地方没有塘的设置。但实际上，清代塘的存在绝不仅限于西北，而是遍布各省。它至少在两个方面发挥作用：第一是防守作用，在这一方面，它总是与汛防等联系在一起；第二是信息传递的作用，这使它经常与铺一起被视为一个地区不可或缺的设置。<sup>④</sup> 就其后一种作用而言，塘还有以下几种类型。

<sup>①</sup> “守令有所申请必由铺以达于偏桥驿。”夏修总修，萧琯、何廷熙纂：《思南府续志》卷二，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修，贵州省图书馆油印本，1965。

<sup>②</sup> 屠述濂纂修：《腾越州志》卷四，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修，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黄秉堃刻本。

<sup>③</sup> “塘，甘肃之安西州、新疆之哈密厅、镇西厅三属，除安西、镇西各本属公文差务仍设驿外，三属旧特设军塘，以达出入文报。自新疆改设行省后，裁哈密、镇西两属军塘，惟安西属军塘仍旧。每塘设有军塘夫以司接递；都司一人，督率稽查。夫马钱粮归文员奏销。”（光绪朝）《清会典》卷五一。

<sup>④</sup> “重门击柝大易，所以甚其防，司险掌疆，周官所以达其节，汛塘哨铺之制，所以诘奸宄而戒不虞也。”王槐荣修，许实纂：《宜良县志》卷三，《建置志》，1921年铅印本。

首先是设在西北地区的军塘。清会典中所提到的哈密、镇西、安西地方的塘是清代新疆驿传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西起伊犁东北的精河（晶河），向东经库尔喀拉乌苏、乌鲁木齐、巴里坤、哈密，到达甘肃的安西，与嘉峪关以东的台站相接。这是清代用兵西北时所设立的军报线路，连接了清代在北疆主要的军事驻防点，战后得以保留。<sup>①</sup> 它的作用主要是传递军营文报，而且，在许多地方，防汛、军台之间距离太远，塘与军台相间于道，可以补充军台间距太大、呼应不灵的缺陷。<sup>②</sup> 到新疆改建行省后，这些军塘与军台一起改为驿站。

其次，在其他省份也都有大量负责传递军营文报的营塘。通常军队的驻扎都以地理形势和军事需要来定，所在多为偏远之地。为方便调度，各提督、总兵等都在自己的防地内安设塘兵，接递军营文报以及本章等其他公文。<sup>③</sup> 所以，这些塘可以被看做专门的军事

<sup>①</sup> 精河——哈密营塘：精河底塘——托多克塘——古尔图塘——敦木达塘——布尔噶济塘——库尔喀拉乌苏奎屯塘——安济海塘——乌兰乌苏塘——玛纳斯塘——土古里克塘——胡图壁塘——昌吉塘——迪化底塘——柴窝铺塘——噶逊底塘——乌鲁木齐——迪化底塘——黑沟塘——阜康塘——大泉塘——清水塘——三台塘——济木萨塘——古城塘——奇台塘——木垒塘——阿克他斯塘——乌浪乌苏塘——色必塘——噶顺塘——乌兔水塘——肋巴泉塘——苏吉塘——巴里坤底塘——奎素塘——松树塘——羊圈沟塘——南山口塘——黑帐房塘——哈密底塘——黄芦冈塘——长流水塘——格子烟墩塘——苦水塘——沙泉子塘——星星峡塘。参见汪廷楷原辑，松筠纂、祁韵士编纂：《西陲总统事略》卷三，嘉庆十四年（1809年）程振甲刻本。

<sup>②</sup> 如，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陕甘总督李侍尧奏报：“乌鲁木齐提督所属自迪化州起至哈密所属星星峡止，绵亘二千余里，多属戈壁，安墩汛二十五处，相距百余里、七八十里不等，途长站大，汛兵不能兼顾，应将原设塘按照旧存留。”《清高宗实录》卷一六一，台北，华文书局影印本。

<sup>③</sup> 据《署理两江总督萨载请将塘兵轮流走递操演折（乾隆四十三年八月十九日）》称：“缘江南各标计八十二营内，或道路迂阔，与文职并不同城，或僻处山隙，或孤悬海外，一切公文不得不设立塘兵专司走递，以期无误公事。”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官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4辑，578页，台北，“故宫博物院”，1987。